

“政治思想史”笔谈

编者按 政治思想史的叙述方式关涉政治思想史的知识背景、现实关怀、研究视域、书写风格及工作平台等,这里组织的一组青年学者的笔谈集中关注这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元理论问题。以当代哲学认识论的主观化倾向为“支援性背景”探讨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深度转换,表明作者的知识论问题意识,重新激活似乎已被打死了的黑格尔话语不是为了学术“炒冷饭”,而是回答全球化语境中的话语通约问题;“政治正确”曾经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前提条件,对以之为核心的研究视域的反思依然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个人性写作”曾是思想史研究的热议话题,梳理它的来龙去脉及指正其应有含义必将能够为该议题提供知识增量,“斯金纳”问答逻辑”的实质是改变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工作平台和工作性质,即政治思想史研究应从史料挖掘转向文本探询。

当代哲学认识论的主观化倾向与政治思想史研究论析

金林南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哲学认识论领域“主观化”倾向的日益明显使当代知识标准、来源、生产方式等发生了重大转换。就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以自然科学为基本典范的政治科学范式从鼎盛走向式微;关注政治思想史的非经典、非连续性;进入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践情境。

关键词:哲学认识论;主观化;政治思想史;政治科学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9)03-0022-03

直观地说,所谓政治思想史研究就是对历史上存在的关于政治的思想、理论、观点等进行介绍、评估,其本质是对政治认识的认识,从认识论研究来说,它应该属于哲学认识论下的一个分支——政治认识论。如果说,哲学认识论立足于一般意义上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通过中介的相互作用,以揭示人类认识的最普遍规律,政治认识论则立足于政治认识主体和政治认识客体——政治现象,通过一定中介的相互作用去揭示人们认识政治的特殊规律。因此,两者是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哲学认识论概括和包含了政治认识活动的普遍属性与一般规律,对政治认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作用,为政治认识论研究,同时也为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支援性背景”。

我国学者夏甄陶先生断定:“认识论按其性质来说,是一门反思的科学。”^[1]如果我们确认只有哲学思维方式拥有最为彻底的反思性特质的话,那么认识论

似乎只能是哲学的基本内容之一,也只有哲学的视域才能提供各种认识论研究所需要的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论只能是哲学认识论。也正因为如此,在很长一个时段内,认识论非但是哲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在近代西方哲学范围内,它几乎成为哲学的主要形态。尽管随着自然科学、心理学、现代逻辑学等具体科学的发展,传统认识论的主题似乎开始“下移”,至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具体认知科学;存在主义、各种后主义思潮、实用主义等也在理论上竭力消解由近代启蒙运动所奠定的理性思维者的主体形象,消解传统认识论。近代哲学意义上以主客两分为主要逻辑预设和基本问题意识的哲学认识论似乎已经式微。但是,当代理性对自身的反思绝对没有因为传统认识论议题的历史性隐退而消逝,只不过它通过认识论进行自我反思的主题和内容发生了切换。要而言之,哲学认识论所具有的反思性特质使理性不断追问自己的认识活动本身,包括对认识的来源(客体)、认识能力与过程、认识主体及认识结果的反思。

因此,尽管不少现当代哲学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

了认识论在基本预设、问题意识、提问方式及存在意义等方面的合法性质疑,但是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反思这个特质从来没有因此而消失过,一定程度上这些质疑本身就构成了认识论在当代的反思性表现。这些反思主要针对传统认识论的问题内涵,使当代认识论对认识过程、认识者、认识结果的反思更为深入。当然,这种反思是伴随着现当代经验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来的,它们对传统哲学认识论的议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认识过程中的“主观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尤其是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使认识论中“过去联结着物理的实在世界和直观的现象世界的这种最后的纽带也被破坏了:直观的空间和直观的时间也同样归结为主观化的过程了。”^{[2]22}经验科学对认识论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人们不必在“或者是绝对知识,或者是怀疑”之间作传统式的非此即彼地选择了,因为:借助于经验—假设陈述,有某种新东西被插进了这两个非此即彼的极端抉择之间:否认绝对形而上学知识的人,不必为此否定一般科学,他可以退回到经验主义的认识立场上去,对于这种立场来说,虽然存在着由经验证明为可靠的陈述,但不存在绝对知识。反过来,否认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人,也不必因此被迫从事形而上学研究了。^{[2]23}

这种主观化倾向标志着当代哲学认识论与传统认识论相比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及思考预设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毋庸置疑,这种主观化倾向是认识论的反思性特质不断超越已有认知框架的产物。

首先,当代认识论再也不以某个终极性存在或信念作为知识存在的前提和真假标准了,认识论出现了反“基础主义”倾向^①。尽管近代哲学的主要表现形态是认识论,但是近代认识论的前提和基础是近代形而上学,正是近代哲学认为存在着一个有待认识的对象——上帝、物理世界、自然和一个拥有认识能力的心灵实体,认识的实现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就是针对这样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康德通过理性批判使认识论反思全面启动了主观化进程,使原本作为认识对象的上帝、物质世界、意志自由等要么只能在宗教道德领域寻求庇护,要么在人的理性范围内成为含糊而暧昧的“物自体”。总之,康德之后的哲学认识论在认识对象、认识主体两方面全面改造、颠覆了传统认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

其次,认识论研究的分化与专业化。传统认识论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对认识的认识退出历史舞台,仅仅是改变了方法视角和工作方式。有一部分传统

认识论问题归入到了一些经验科学中去,比如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脑科学、人工智能学等。

再次,当代认识论对认识结果的反思形成了包括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知识—权力考古学在内的新兴学术领域。这些新兴领域使认识论的反思进入到更加精深的微观领域,关注知识的社会、政治、文化起源及其效应。

最后,反思性使认识论开始关注在传统认识论中一直作为理性主体、中立的旁观者面目出现的认识主体。通过对认识主体的反思,考察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挖掘认识主体的生存情境,改变了传统认识论中理性化主体的定位。这种改变使当代认识论实现了从知识论向生存论、实践论的转向。同时,在对认识者进行认识论意义的反思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思想空间——知识分子理论,它是当代认识论理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当代认识论主观化和实践化倾向的集中体现。

二

当代哲学认识论的“主观化”倾向对政治思想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消解以主客两分为基本预设的经验科学研究范式,使以自然科学为基本典范的政治科学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从鼎盛走向式微;政治思想史研究开始关注非经典、非连续性等“历史零落的时间”;政治思想史研究进入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践情境。

以美国的政治科学为主要学科背景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曾经在西方学术舞台占据主导地位,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其一,尊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政治思想史研究界定为对政治思想经典文本进行“科学化”解读的活动。萨拜因在其《政治学说史》一版前言中就明确表明自己同意“休谟对自然法的批判作出的结论。因为,就愚见所及,要凭任何逻辑的作用推断出事实的真相是不可能的,任何不论是逻辑还是事实也都并不含有价值。”^{[3]4}秉承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是政治科学范式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立场。其二,主要围绕经典思想家和经典文本展开研究。萨拜因就认为在政治发展中政治理论家甚至比政治家具有更大的作用;“政治理论家是一种超级政治家——他反复思考并说明某些联系的性质和可取之处,而这对实际的政治领袖来说,可能由于没有时间而无法独自去理解和分析……孟德斯鸠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他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的行动者,肯定比康华里或甚至比华盛顿更为重要”^{[3]5-7}。

① 值得注意的是,现当代哲学中的“反形而上学”倾向与认识论领域的反“基础主义”趋向之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理论观点上都不是完全对应的,尤其在现代哲学的早期阶段。例如早期分析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作为自己主要的理论立场,而在认识论领域却主张一种再明显不过的“基础主义”。当然,现代哲学中的存在论哲学、后现代哲学等对形而上学和“基础主义”都采取了批判、颠覆的理论姿态。关于“基础主义”的理论内涵、历史演变、学说主张以及理论困境等请参见: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82-203;胡军,《知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3-203。

与萨拜因几乎属于同一时期的美国“历史观念史”的开创者阿瑟·诺夫乔伊把思想史的研究聚焦于“观念的单元”,并且关注那些经典思想家的著作,把他们的著作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唯一材料^[4]。

以科学中立、价值无涉为宗旨的政治科学范式在政治思想史等研究领域逐渐退场。按照甘阳先生的勘定,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以批判政治价值中立和恢复古典政治哲学为重要学术旨趣的施特劳斯学派的形成,流行了几十年的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逐渐被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史》所替代^[5]。

不可否认,对著名政治思想家、经典政治学派和具有很强社会效应的政治思潮的认识能够对我们理解政治具有很大的“示范”作用,可以更方便地领会政治思想史的典型特征,也可以更“合理地”对政治思想作出“同心圆的描述”。但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认为,“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6]。在福柯看来,过去的思想史(以历史哲学为典型)总是试图对一种思想观念作目的论式的解读,使思想史中存在的断裂和非连续性被删掉,使之看上去具有一个“全面历史的主题”。而福柯认为,思想发展中最真的东西,恰恰是话语的断裂和非连续性,是理论逻辑中独特的异质性。由精英知识分子所塑造的经典思想“有时候只是一种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操练的场地,它常常是悬浮在社会与生活的上面的。真正的思想,也许要说是真正在生活与社会中支配人们对世界进行解释和理解的那些常识,它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7]。这里绝对不是要否认经典思想家及其理论思潮对认识政治思想史的作用,而是要理性地认识到过度偏重经典带来的局限。过度偏重于经典可能使我们忽视包括常识在内的非经典所具有的文化底色或基石作用,把活生生的政治思想世界过滤为由独立的经典作家构成的抽象理论和原则。

在目前西方学术界,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学派,他们在该领域的创新被有的学者称为“政治思想研究中的革命”或“斯金纳式革命”^[8]。“剑桥学派”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上具有很多创新,最突出的是他们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宏大历史叙事转移到政治思想的历史性语境上,在历史的语境中考察政治思想。斯金纳说: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语言行动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9]。

显然,斯金纳此处所言“历史方法”是颇具新意的,这是一种把某种政治思想的历史情境作为政治

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尝试进入到某种政治思想的历史性活动场景或空间中去把握它。这种政治思想史研究方式不再把政治思想当作一种纯粹的知识观念,认为它就是一种政治活动方式。在这样的视野下,政治思想史研究从观念史研究转向政治的活动、行为、论辩、语境等非观念意识的历史性探究。这样的研究获得的不再是政治的理论体系和概念范畴,而是充满细节和不确定情势的政治生活世界。因此,“思想即为行动”,“政治作为活动”成为该学派研究特色的形象概括。

三

对当代哲学认识论主观化倾向及其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影响的概略性介绍和解读表明:在当代哲学认识论视域里,当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正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格局,对政治思想的揭示越来越深刻和丰富,主要表现为:

其一,政治思想史研究越来越摒弃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性目标和抱负,开始使政治思想史研究越来越远离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真理性标准,而越来越愿意接近政治生活世界。政治思想史研究越来越接近政治认识的“真相”。

其二,政治思想史研究策略上的宏观与微观关系越来越协调。政治科学走上历史舞台之初,一个重要的理论使命就是摒弃抽象的哲学史研究方法,使政治思想史研究走向经验实证领域。而当政治史学研究方式出现时,那种局限于科学经验和经典文本的狭隘的研究方式得到了克服,政治思想史研究既有宏观的大视野,又具备丰富多彩的细节。

其三,政治思想史研究从纯粹的知识观念研究走向政治实践论、政治生存论研究,这样的突破和创新必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开创更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 [1] 夏甄陶.认识论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
- [2]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册[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3]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一版前言)[M].盛葵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4] 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M].张传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 [5]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3.
- [6]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7.
- [7]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13.
- [8] 凯瑞·帕罗内.历史·政治·修辞: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M].李宏图,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3.
- [9] SKINNER Q. Vision of politics, Preface[M]. Cambridge: CUP, 2002: 8.